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析評

胡楚生^{*}

摘要

《春秋》三《傳》，釋《經》觀點，已多不同，唐代陳岳，曾撰《春秋折衷論》三十卷，頗能於《三傳》釋《經》之異同處，加以折衷，或求其會通。

陳氏之書，雖已久佚，清代馬國翰於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中，曾輯得三十條（含序文一條，則為三十一條），較諸原書，雖相距甚遠，然也可以從而窺見其書內容之大略。

本文之作，即從陳氏書中，刺取例證，加以分析評論，不僅希望彰明陳書之要旨，也期望能夠彰顯陳書在《春秋》學史上之價值與地位。

關鍵詞：陳岳 春秋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

^{*}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開悟講座教授兼國學研究所講座教授

一、引言

《春秋》之學，發展至唐代，貞觀年間，太宗詔令孔穎達與諸儒，撰定《五經正義》，¹ 其中《左傳正義》一書，專疏杜預《集解》，由是杜注之學，定於一尊。

及至玄宗開元天寶以後，啖助、趙匡、陸質等人，² 鑽研《春秋》，以為三《傳》之說，多未能通達《春秋》大旨，因是不守注疏，不遵三《傳》，而專於《春秋》一書，直探古經義趣。啖助所撰《春秋集傳集注》及《春秋統例》，趙匡所撰《春秋闡微纂類義統》，均已亡佚，陸質所著《春秋集傳纂例》十卷、《春秋集傳辨疑》十卷、《春秋集傳微旨》三卷，尚存。稍後，盧仝撰《春秋摘微》，韓愈譽之，以為「就經明經」，是真能「《春秋》三《傳》束高閣，獨抱遺《經》究終始」³ 者也。

至於晚唐時期，吉州廬陵人陳岳，著《春秋折衷論》三十卷，《崇文總目》曰：「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，參求其長，以通《春秋》之義。」⁴ 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曰：「其書以《左傳》為上，《公羊》為中，《穀梁》為下，比其異同而折衷之。」⁵

陳岳之書，元代以後，已經亡佚，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據章如愚《群書考索》續集，輯得二十六節（馬云二十七節，則是含序文一條計算），及〈序〉一篇，又據程端學《春秋本義》輯得四節，總計為三十節，合為一卷。馬國翰曰：「原書三十卷，三百餘條，此雖十不存一，然大旨可觀，足與啖、趙、陸三家，抗衡唐代矣。」⁶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·自序》曰：「聖人之道，以《春秋》而顯，聖人之文，以《春秋》而高，聖人之文，以《春秋》而微，聖人之旨，以《春秋》而奧，入室之徒，既無演繹，故後之學者，多失其實，是致三家之《傳》，並行於後，俱立學官焉」。又曰：「《左氏》多長，《穀梁》多短，然同異之理，十之六七也。」⁷

陳岳之書，馬國翰輯得一卷之外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之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，⁸ 於陳岳之書，也據章如愚《群書考索》續集輯得二十六條，而其中文字，與馬氏所輯出者，或有不同，正可以相互參校，以求其是，唯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，於陳岳之書，未據程端學《春秋本義》，多輯得四條耳。

¹ 唐太宗貞觀七年（西元六三三年），頒定《五經正義》。

² 啖助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二年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（西元七二四—七七〇年），趙匡之生卒年不詳，陸質生於玄宗開元二十九年，卒於德宗貞元二十一年（西元七九六—八〇五）。

³ 見韓愈：〈寄盧仝〉，載《韓昌黎全集》卷五，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《四部備要》本）。

⁴ 王堯臣：《崇文總目》，喬衍琯：《書目續編》本，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），一九六八年。

⁵ 晁公武：《郡齋讀書志》，喬衍琯：《書目續編》本，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），一九六八年。

⁶ 馬國翰：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，臺北，大通書局影印原刻本，下引並同。

⁷ 同注 6

⁸ 朱彝尊原著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點校：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，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），一九九七年。

以下，即據馬氏所輯陳岳之書，參以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所輯出者，並檢覈章如愚《群書考索》（新興書局影印本）、程端學《春秋本義》（通志堂經解本）所引述者，略事枚舉，並加分析，其有文字之異同者，如有涉及《經》義之大者，則加注明。以見陳書內容之一斑焉。

二、析評

（一）論「元年春王正月」

《春秋》隱公元年曰：「春，王正月。」《左氏》謂周平王，《公羊》謂周文王，《穀梁》謂周平王。⁹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曰：

《春秋》所以重一統者，四海九州，同風共貫，正王道之大範也，迺以月次正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春次年，年次元，斯五者，編年紀事之綱領也，故書王以統之，在乎尊天子，卑諸侯，正升黜，垂勸懲，作一王法，為萬代規，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，故用隱之元，統平之春，存平之正，得不書平王歟！苟曰周書始命之王，則二年復書何王？必不然也，平王明矣，斯《公羊》之短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，得其實矣。¹⁰

今案杜預〈左傳序〉曰：「然則《春秋》何始於魯隱公？答曰，周平王，東周之始王也，隱公，讓國之賢君也，考乎其時則相接，言乎其位則列國，本乎其始，則周公之祚胤也，若平王能祈天永命，紹開中興，隱公能弘宣祖業，光啓王室，則西周之美可尋，文武之跡不隊。」又曰：「所書之王，即平王也，所用之曆，即周正也，所稱之公，即隱公也。」¹¹ 考周武王克商紂王，統一天下（時為西元前一一二二年），建都於鎬，成王因之，十一傳，而至幽王，申侯率犬戎入寇，弑幽王，幽王之子宜臼，立為平王，元年（西元前七七〇年），遷都洛邑，以避戎寇，是為東周；魯隱公名息姑，乃惠公之子，有讓國之賢名，孔穎達《左傳正義》曰：「隱公之初，當平王之末，是相接也。」又曰：「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，隱公三年而平王崩，是其相接也。」此「《左傳》家」以隱公元年「王正月」為平王之說也。又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，春者何？歲之始也，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」何休《解詁》曰：「以上繫王於春，知謂文王也，文王，周始命之王，天之所命，故上繫天端，方陳受命，制正月，故假以為王法，不言諡者，法其生，不法其死，與後王共之，人道之始也。」徐彥《公羊注疏》曰：「孔子方陳新王受命，制正月之事，故假取文王，創始受命，制正朔者，將來以為法，其實為漢矣。」¹² 陳立《公羊義疏》曰：「《春秋》有五始之義，春者四時之始，王者受命之

⁹ 同注 6

¹⁰ 同注 6。此據馬氏輯本，並參考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所引述者，其有異同，則加注明。

¹¹ 孔穎達：《左傳注疏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下引並同。

¹² 徐彥：《公羊傳注疏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下引並同。

始，繫王於春，明王爲受命之王，故宜謂文王矣。」¹³ 此「《公羊》家」以隱公元年「王正月」爲文王之說也。又范寧〈春秋穀梁傳序〉曰：「昔周道衰陵，乾綱絕紐，禮壞樂崩，彝倫攸斁，弑逆篡盜者國有，淫縱破義者比肩。」又曰：「孔子睹滄海之橫流，迺喟然而嘆曰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！言文王之道喪，興之者在己，於是，就大師而正雅頌，因魯史而修《春秋》，列〈黍離〉於《國風》，齊王德於邦君，所以明其不能復雅，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。於時則接乎隱公，故因茲以託始。」楊士勛《穀梁注疏》曰：「平王四十九年，隱公之元年，故曰接乎隱公，亦與惠公相接，不託始於惠公者，以平王之初，仍賴晉鄭，至於末年，陵替尤甚，惠公非是微弱之初，故不託始於惠公，隱公與平王相接，故因茲以託始也。」¹⁴ 此「《穀梁》家」以隱公元年「王正月」爲平王之說也。陳岳綜舉三《傳》之說，以爲《春秋》之作，在於「作一王法，爲萬代規」，以垂型萬世，故即用魯隱公之元年，託以周平王之春天，並保存周平王在周代歷史上之正統地位，所以指隱公元年春之「王正月」，實明示即周平王，否則，不以平王居首偏年，則隱公二年，陳岳以爲，則又將以周代何王爲論？故陳岳以爲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之說，爲得其實。

（二）論「鄭忽出奔衛」

《春秋》桓公十一年：「鄭忽出奔衛。」《左氏》曰：「祭仲與宋人盟，以厲公歸而立之，秋，九月，昭公奔衛，已亥，厲公立。」《公羊》曰：「忽何以名？《春秋》伯子男，一也，辭無所貶。」《穀梁》曰：「其名，失國也。」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曰：

忽，太子也，兄也，正也；突，公子也，弟也，非正也；忽既立，則祭仲之君，以君臣之義，顛則扶之，危則持之，力不足則死之，又知突在宋，非會非聘，爲宋所誘，其無謀甚矣，往而被執，不能死節，歸立厲公。

今案《左傳》記載，鄭莊公有子四人，分別名忽（後立爲鄭昭公）、突（後立爲鄭厲公）、豐、儀，太子忽曾領兵救齊，大敗北戎，齊君將妻以文姜，忽曰：「人各有耦，齊大，非吾耦也。」乃拒之。及鄭莊公卒，大臣祭仲立太子忽，是爲昭公。後祭仲赴宋，宋人誘迫祭仲，令立公子突（爲宋女之子），祭仲返國，乃立公子突爲厲公，昭公因而出奔於衛。《公羊傳》以爲，《春秋》對伯子男三等爵位，一律稱名，因此，於此處稱忽之名，也並無貶低之意。《穀梁傳》以爲，「鄭忽者，世子忽也，其名，失國也」，稱忽之名，而不稱其爲昭公或世子，乃是因其失去國君之位。陳岳於三《傳》之外，則深斥祭仲，身爲大臣，既不能扶顛持危，忠於其君，又不能拒誘拒謀，以死殉國，反畏敵死亡，屈從宋人，廢君而又立君，出爾反爾，但求利己，故乃深加斥責，辭甚嚴而義極正也。

¹³ 陳立：《公羊義疏》

¹⁴ 楊士勛：《穀梁注疏》，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），下引並同。

（三）論「秋，大水，鼓，用牲于社于門」

《春秋》莊公二十五年：「秋，大水，鼓，用牲于社于門。」《左》曰：「非常禮也。」《公》曰：「於社禮也；于門，非禮也。」《穀》曰：「既戒鼓以駭眾，用牲可以已矣。」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曰：

凡書災異多矣，大則日月之食，小則水旱之災，夫正陽之月，陰氣未作，不宜侵陽，苟月掩日，則臣掩君之象，是以伐用幣；正陽既過，則一陰生，為災輕也，故日食，不伐鼓用幣矣，得禮正也。如水旱之災，則國之常，不繫于君臣順逆，故但書記其為災而已，斯伐鼓用幣者，識其非常也，《左》得其旨。

今案《左傳》云：「夏，六月，辛未朔，日有食之，鼓用牲于社，非常也，唯正月之朔，慝未作，日有食之，於是乎用幣于社，伐鼓于朝。秋，大水，鼓，用牲于社于門，亦非常也。凡天災，有幣無牲，非日月之眚，不鼓。」以為唯有正月初一，發生日蝕，才可以擊鼓於朝廷，用布帛祭於社廟，以日蝕之災，如在秋天發生巨大水災，也在朝廷擊鼓，用牛羊牲犧祭祀社神與門神，則非經常之禮儀。《公羊傳》以為，秋天發生巨大水災，則可以擊鼓於朝廷，但用牛羊犧牲祭祀社神，雖合於禮儀，但用以祭祀門神，則不合於禮儀。《鼓梁傳》以為，秋天發生巨大水災，既已鳴擊鼓聲，警戒民眾，則以犧牲牛羊祭祀社神，似可不必再用。對於三《傳》不同的解釋，陳岳以為，適逢正月，陽氣方盛，如係發生日蝕，有下臣掩蔽君上之象，則是可以擊鼓示警，用幣祈福。如果不在正月，發生日蝕，則為災尚輕，雖不鳴鼓用幣，也仍屬得禮之正。而水災旱災，則是世事之常態，與君臣順逆，並無關涉，擊鼓用牲，似也不必，故陳岳以為，《春秋》此條之義，《左傳》所說，最能得其旨要。

（四）論「齊人來歸鄆、讙、龜陰之田」

《春秋》定公十年記曰：「齊人來歸鄆、讙、龜陰之田。」《左氏》曰：「孔子受盟，請反汶陽之田。」《公羊》曰：「行乎，季孫，三月不違，齊人來歸之。」《穀梁》曰：「罷會，齊人使優俳施舞于魯君之幕下，孔子曰，笑君，罪當死，乃使殺之，齊人為是歸之。」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曰：

齊魯，甥舅之國，代為婚姻，時或侵或伐，或平或隙，靡有所定，故上書「春，及齊平」，次書「夏，公會齊侯于夾谷」，終書「齊來歸鄆讙龜陰之田」，是二國平和之後，會于夾谷，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，尼父以公退，以大義沮之曰：「於德為怨義，於人為失禮，君必不然。」齊人聞，遽辟之，乃盟曰：「齊師出境，不以三百乘從我者，有如此盟。」尼父曰：「不反汶陽之田，吾以供命者，亦如之。」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。噫！齊，強國也，魯，弱國也，以力爭之不可也，以勢競之不可也，惟可以義服之，以言折之，聖人用是，而齊沮其謀，反其田，斯《左氏》得其旨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皆短。

今案《左傳》定公九年，魯大夫陽虎率士卒入於讎及陽關，因以叛魯而奔齊，十年，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，孔子隨行，相禮，遂爲盟。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所敘，至「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」以上，即本於《左傳》之記事。《公羊傳》以爲，孔子於魯國季孫氏掌權時，爲政行道，三月之中，鮮少違失，且有政聲，故齊侯遂歸還汶陽之田，以示修好。《穀梁傳》以爲，夾谷之會，既盟，齊人以優施舞於魯君之前，欲以諷之，孔子嚴辭斥責，乃加之刑，齊人震駭，因歸還汶陽之田。綜舉三《傳》不同之說，陳岳以爲，齊強魯弱，唯孔子能以道義之立場，說之以嚴正之言論，以理折之，所言「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，俘不干盟，兵不逼好」，方是光明正大之行爲，否則，如齊侯唆使蠻夷萊人，以兵力劫持魯侯，則此種行爲，「於神爲不祥，於德爲愆義，於人爲失禮」，經由孔子之嚴正聲明，方才使得「齊沮其謀，反其田」，所以，陳岳以爲，《左氏》得其旨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皆失也。

（五）論「春用田賦」

《春秋》哀公十二年：「春，用田賦。」《杜》曰：「邱賦之法（馬氏輯本邱作「兵」），因其田，通出馬一匹，牛三頭，今欲別其田及家財，各爲一賦，故言田賦。」《公》曰：「軍賦十井，不過一乘，今復用田賦，過十一也。」《穀》與《杜》同。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曰：

《春秋》常賦不書，苟書之，必譏其重斂也，復書用田賦，可知其害人矣，謂作者不宜作，謂用者不宜用，皆聖人之微文也，自作邱甲之後，已破十一之稅矣，田賦軍賦，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，今別爲田，明矣，《杜氏》、《穀梁》得其旨。

今案《春秋》哀公十二年記曰：「春，用田賦。」指按田畝多少以徵稅徵兵。《左傳》曰：「季孫欲以田賦，使冉有訪於仲尼，仲尼曰，丘不識也，三發，卒曰，子爲國老，待子而行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，仲尼不對，而私於冉有曰，君子之行也，度於禮，施取其厚，事舉其中，斂從其薄，如是，則以丘，亦足矣。」《杜預注》曰：「丘賦之法，因其田財，通出馬一匹，牛三頭，今欲別其田及家財，各爲一賦，故言田賦。」又曰：「丘，十六井，出戎馬一疋，牛三頭，是賦之常法。」又《公羊傳》曰：「何以書？譏，何譏爾？譏始用田賦。」何休《解詁》曰：「禮，稅民公田，不過什一，軍賦，十井不過一乘，哀公外慕強吳，空盡國儲，故復用田賦，過十一。」又《穀梁傳》曰：「古者公田什一，用田賦，非正也。」范寧《注》曰：「古者九夫爲井，十六井爲丘，丘賦之法，因其田財，通共出馬一匹，牛三頭，今別其田及家財，各出此賦，言用者，非所宜用。」又曰：「古者五口之家，受田百畝，爲官田十畝，是爲私得其什，而官稅其一，故曰什一，周謂之徹，殷謂之助，夏謂之貢，其實一也，皆通法也，今乃棄中平之法，而田財並賦，言其賦民甚矣。」是則三《傳》所論，杜預、何休、范寧所釋，義多相近，皆與孔子所謂「斂從其薄」之意相合，不欲於丘賦之外，別用田賦也，陳岳專謂《穀梁》、《杜氏》得其旨，所見則似稍偏。

（六）論「西狩獲麟」

《春秋》哀公十四年：「西狩獲麟。」《左氏》曰：「獲麟者，仁獸，聖王之瑞。」《公羊》曰：「非中國之獸。」《穀梁》曰：「不外麟于中國也。」

陳岳《春秋折衷論》曰：

《春秋》書災異，不書祥瑞，斯麟者瑞也，曷以書之者？非為祥瑞而書，以聖人感麟至而書也。夫言祥瑞，豈限中國四夷歟！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為瑞，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，皆原為瑞，必不然矣，蓋取其隱見不常，天下有道則至，為瑞明矣，然《公羊》曰：「顏回死，子曰，天喪予。子路死，子曰，天祝予。」西狩獲麟，為仲尼之應，顏回子路，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，聞其死，曰，天喪予者，皆痛惜之辭，安可以獲麟為比？麟鳳則王者之瑞，既出，無其應，聖人迺感麟而起，以修《春秋》，麟出既非為己，《春秋》修亦非為己，蓋懲惡勸善，為百世之法，如河不出圖，洛不出書，吾已矣夫，斯皆為周德之衰，無明王之應，非為己也。孟軻謂仲尼之道，高於堯舜，何道窮之有？《左氏》得其實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之短也。

今案《左傳》曰：「春，西狩於大野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，以為不祥，以賜虞人，仲尼觀之曰，麟也，然後取之。」杜預《注》曰：「麟者仁獸，聖王之嘉瑞也，時無明王，出而遇獲，仲尼傷周道之不興，感嘉瑞之無應，故因魯《春秋》而修中興之教，絕筆於獲麟之句，所感而作，固所以為終也。」孔穎達《左傳正義》曰：「以聖人之生非其時，道無所施，言無所用，與麟相類，故為感也，仲尼見此獲麟，於是傷周道之不興，感嘉瑞之無應，故因魯《春秋》文加褒貶，而修中興之教，若能用此道，則周室中興，故謂《春秋》為中興之教也。」此為《左傳》之說，主要在於孔子自傷生非其時，與麟相似，故感慨而作《春秋》。又《公羊傳》曰：「何以書？記異也，何異爾？非中國之獸也，然則孰狩之？薪采者，薪采者，則微者也，曷為以狩言之？大之也，曷為大之？為獲麟大之也，曷為獲麟大之？麟者仁獸，有王者則至，無王者則不至，有以告者曰，有麋而角者，孔子曰，孰為來哉！孰為來哉！反袂拭面，涕沾袍，顏淵死，子曰，噫！天喪乎！子路死，子曰，噫！天祝予！西狩獲麟，孔子曰，吾道窮矣。《春秋》何以始乎隱？祖之所逮聞也，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，何以終乎哀十四年？曰，備矣。君子曷為為《春秋》？撥亂世，反諸正，莫近諸《春秋》。」何休《解詁》曰：「夫子素案圖錄，知庶姓劉季，當代周，見薪采者獲麟，知為其出，何者？麟者木精，薪采者，庶人燃米之意，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，故麟為薪采者所執，西狩獲之者，從東方王於西也，東、卯，西、金象也，言獲者，兵戈文也，言漢姓卯金刀，以兵得天下。」又曰：「夫子知其將有大國爭強，縱橫相滅之敗，秦項驅除，積骨流血之虞，然后劉氏乃帝，深閔民之離害甚久，故豫泣也。」又曰：「孔子仰推天命，俯察時變，卻觀未來，豫解無窮，知漢當繼大亂之后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。」此為《公羊傳》之說，主要在於指陳孔子預知周室將衰，

劉季當興，故作《春秋》以授漢。又《穀梁傳》曰：「引取之也，狩、地，不地，不狩也，非狩而曰狩，大獲麟，故大其適也，其不言來，不外麟於中國也，其不言有，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。」范寧《注》曰：「夫〈關雎〉之化，王者之風，〈麟之趾〉，〈關雎〉之應也，然則斯麟之來，歸於王德者矣，《春秋》之文，廣大悉備，義始於隱公，道終於獲麟。」此《穀梁傳》之說，主要以爲《春秋》之書方成，而麒麟適至，是《春秋》正引領麒麟瑞應而至也。陳岳不取《公羊傳》之說，以爲其說涉於虛誕，且《公羊傳》之說，孔穎達已自駁之，《左傳正義》曰：「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，漢氏起於匹夫，先無王跡，前期三百許歲，天已豫見徵兆，其爲靈命，何太遠乎！」（今案《春秋》獲麟，當西元前四八一年，漢高祖即帝位，當西元前二〇二年，相距約二七九年之久），陳岳以爲，《穀梁傳》亦偏於比附，蓋陳岳以爲，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主要在於「懲惡勸善，爲百世之法」，正求爲後世建立是非善惡之準則，並非爲一己私人之感慨，豈當有「吾道窮矣」之嘆息！故陳岳以爲，《左傳》之說，能得其實也。

以上所枚舉者，雖僅六例，而陳岳之書，其論證之方式，判斷之準則，或亦可以窺見一斑。

三、結語

綜合前所分析討論者，約可得到幾點意見，以作本文之結語。

- （一）《春秋》三《傳》，解說《經》義，已自不同，而古代學者，已早有人爲之折衷討論，以見其異同得失者，據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所載，東漢馬融，已有《三傳異同說》，韓益有《春秋三傳論》，惜多已亡佚，唯馬融之書，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，尚存有輯本。
- （二）唐代末葉，陳岳所撰《春秋異同評》三十卷，其所評論，凡三百餘條，篇幅當最爲龐大，雖亦久佚，而馬國翰所輯錄者，尚得三十條，則僅居原書約十分之一，此文之作，所刺取爲例證者，僅舉六條，於輯本爲五分之一，於陳岳原書，恐僅爲五十分之一，但嚙鼎一臠，或亦可以略爲窺見陳書之要旨。
- （三）清儒擅長輯佚之學，馬國翰之外，如王謨、黃奭、王仁俊、余蕭客、嚴可均等，爲數尚多，如能參酌諸家之書，擴大輯佚之範圍，廣蒐各種類書及新發現之文獻，則於陳岳之書，雖不能盡復三百餘條之舊，然將輯獲更多資料，對陳岳之書，當能有更加詳盡之瞭解，則是斷言之事。
- （四）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以爲，陳岳之書，「以《左傳》爲上，《公羊》爲中，《穀梁》爲下」，其所謂上、中、下，義不顯豁，今考陳書輯本三十條，解釋《春秋》之義，其中以《左傳》之說爲長者，約二十條（合杜預之注），以《穀梁傳》之說爲長者，約九條，以《公羊傳》之說爲長者，僅有一條。而明指釋《經》之誤者，《公羊傳》有十二條，《穀梁傳》有七條，《左傳》僅有三條。持與晁公武之說相比較，似不甚相符。

- (五) 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所輯陳岳之書，附有元人吳萊所撰之〈春秋折衷論後序〉一篇，〈序〉文曾曰：「蓋昔漢儒，嘗以《春秋》斷獄，予謂非徒《經》法可以斷獄，而獄法亦可以斷《經》，何者？兩造之辭具備，則偏聽之惑，無自而至矣。」陳岳之書，折衷三《傳》，以釋《春秋》，其用心，或亦如吳萊所言，希望去偏聽而求其是非，其「折衷」三《傳》所得，理應頗為公允，方合理想。
- (六) 筆者嘗撰有〈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析評〉一文，¹⁵ 在該文之末，曾討論「研治《春秋》如何取徑之問題」，筆者舉出歷代學者研治《春秋》，大約採取四種途徑，其一，「兼治三《傳》，求其會通。如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所從事者」。其二，「兼治三《傳》，求其是非。如傅隸樸《春秋三傳比義》所從事者」。其三，「兼治一《傳》，酌參異說。如皮錫瑞研治《春秋》所從事者」。其四，「不信三《傳》，獨據古《經》。如唐人盧仝所從事者」。然而，筆者於閱讀廖平與陳岳之書以後，心中感覺二人書中折衷三《傳》，而偏愛《左傳》之處，仍不能免，昔者，章學誠嘗有言曰：「宋儒有朱陸，千古不可合之同異，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。」¹⁶ 筆者之於三《傳》異同，亦有同感。至是，尤為感覺，研治《春秋》，專守一《傳》，如皮錫瑞所主張者，恐仍屬較為妥當之途徑。

¹⁵ 胡楚生：〈廖平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析評〉，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《經學研究集刊》第三期，二〇〇七年十月，頁 1-24。

¹⁶ 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——朱陸》，（臺北：國史研究室），一九七三年。